

社會組第三名

唐斯模型 (Downsian model) 與 台灣加入聯合國

黃正杰 / 行政院僑務委員會薦任科員

壹、前言

1991年6月，黨國體制下的立法院通過黃主文等八十五位立委提案，建議政府積極拓展外交關係，並於適當時機以中華民國名義重返聯合國，「參與聯合國」議題正式出現在台灣的政治議程。至1993年初，李登輝前總統在4月9日的國大臨時會開幕典禮中，正式宣告「我們要積極爭取參與聯合國」，加入聯合國這個當前最重要的政府間國際組織，自此成為中國國民黨政權「務實外交」或「彈性外交」之重點。而民進黨也在行動上持續推動此一議題，希望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促使獨立目標的達成，並確保台灣的生存安全。國、民兩黨連續幾年，在聯合國大會召開期間，均組成不同的宣達團前往美國紐約的聯合國總部，向世界各國傳達台灣希望加入聯合國的心聲。九〇年代初期國、民兩黨雖同時推動台灣參與聯合國，但在參與的方式和名稱上有所不同，即中國國民黨堅持以中華民國的名稱尋求重返聯合國，而民進黨則主張以台灣的名義，尋求以新會員的身分申請加入聯合國，雙方各持不同的觀點和立場，前者的理論基礎是依據「分裂國家理論」，後者則採「新生

國家理論」(許世楷，1999、2002；許世楷、施正鋒，2001：45)。

但在推動幾年後該訴求逐漸淡化，也不再成為政黨間外交議題的重大歧異，近年來外交部的參與聯合國造勢活動，也穿插使用中華民國及台灣兩種名稱，如中華民國在台灣、台灣的中華民國等等，即使民進黨在2000年取得總統大選勝利，但在做法上仍與國民黨政府相差不大，並未堅持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對這種朝野政黨在外交、中國政策越趨接近的現象，論者(吳玉山，1998、2001；明居正，1998；陳明通、王智盛，2000)曾依據Anthony Downs的理論提出「選票極大化」(vote-maximizing)模式，認為由於選民偏好的常態性分配，台灣各主要政黨基於理性而尋求最多選票，因此展開政黨轉型向中間路線靠攏，導致外交和中國政策的趨同，繼續以中華民國體制作為對外政策的基礎。

在此，我們質疑，台灣的民意分布真是單峰型(倒U字型)的常態分布嗎？1999年7月李登輝前總統發表「兩國論」，雖受到中國的文攻武嚇及國內統派媒體的群起圍剿，但根據國內各單位民調顯示，其主張大體上都能獲得六成上下的支持，有

些甚至高達七成以上（林佳龍、郭臨伍，2000：510），支持台獨的選民也遽增為42.9%以上（施正鋒，2001：122）；而今年8月陳水扁總統在世台會的談話提出「一邊一國論」¹和「公投決定台灣前途」，同樣也分別獲得五成四和六成二民意的支持（自由時報，2002.8.5）。倘以統獨為台灣政治光譜的兩端，這樣的民意呈現的是常態分布嗎？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視唐斯模型（Downsian model）的基本假設，並證明其不適用於台灣。

貳、唐斯模型（Downsian model）及其批判

有關政黨競爭的經典研究，首推Anthony Downs（1957）的名著「民主的經濟理論」（*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Downs稱其模型為一種經濟理論，乃因其引用市場經濟的概念，來幫助解釋自由民主體制下的政治行為。簡單的說，其基本假設是，在政治市場（political market）中，政黨和選民的行為都是自利而理性的。政客的主要興趣在獲取權力，就像商人尋求利潤極大化一樣。政客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就要在選舉中獲得選票，換句話說，就是把他們的政策產品在政治市場中賣出。而因為政治市場和經濟市場一樣是競爭的，因此選民能依據理性來選擇最能滿足其利益的產品或政策。結果是能贏得權力的政黨，就是最能成功形成吸引最多選票的政策之政黨。選舉的選擇性因此確保了政黨和政客能確實和民意連結，因為這是他們能贏取或維持政府權力的唯一方式。

詳而言之，Downs假設選民的政策偏好可以呈現在單一的左右光譜，而追求選票

極大化的政黨將視民意在左右光譜的分布狀況，來決定自身的位置。在其最有名的論述中，Downs想像民意圍繞著中心點，形成一個對稱的、單峰分布的狀況（即**倒U字型**）。這個假設很簡單但也可能：在中間比在兩邊會有更多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兩黨體系中追求選票極大化的政黨將聚合在中心點。政黨剛開始可能站在端點，但將會朝向中心移動，因為可獲得更多選票，而流失的邊緣選票相較下顯得微不足道。一旦政黨聚合在中心點，均衡就達成了，也沒有誘因改變自身的位置。

當然民意的不同分布會對政黨產生不同的誘因，例如在兩極化的社會中，民意分布呈U字型，政黨就不會向中聚合，因為這會流失為數更多的兩極選票。

對於Downsian model的假設，學者（Heywood, 1992:283; Hague, Harrop & Breslin, 1998:139）認為有以下問題，導致其謬誤：

一、Downs認為政客或政黨之間的競爭是真實而有效的，但事實上只有二到三個政黨享有獲得權力的可能。政治市場的競爭受到既存不利新政黨進入政治市場的障礙之限制，例如，選舉的高成本和選民既有政治忠誠的習慣特質。

二、選民在決定投票對象時，並沒有充分的知識或完全的獨立判斷能力，因此可能無法理性投票，也並非基於自己的利益。正如商人試圖藉由廣告來影響消費者品味和需求，政黨也試圖運用宣傳來操縱選民的觀點和價值，而大眾的資訊則來自政客的宣傳。

三、Downsian model假設對政客的主要影響力來自選民，因而它忽略了其他形式的政治壓力和影響。事實上政府必須重視

組織性團體的觀點，尤其是擁有經濟權力者。因此，自由民主理論必須注意這些影響力團體的權力分配狀況。

四、Downs假設政黨只是在搶位子（office-seeking），這可能適用於美國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兩黨體系。但在歐陸更為複雜的意識形態政黨體系，政黨間的競爭是為了政策，而非僅為權位。

透過對Downsian model的釐清與批判，回過頭來檢討台灣學界目前援引此一模型，事實上的確存在著理論的誤用。首先，Downsian model並不適用於台灣的意識形態政黨體系，誠如林濁水和梁文傑所言（1999：64），對於台灣這個在國家建立（state-building）和民族建立（nation-building）上面臨困難且民意分布仍有長足變動與發展可能性的國家而言，此一模型的適用性顯得相對薄弱。其次，正由於意識形態在台灣政治中的重要性，因此政黨間的競爭應該是意識形態之爭，也就是台灣民族主義和中華民族主義的對決（彼薩列夫、林湘義，2002），爭的是政策的實踐，絕非單純像美國實用主義一樣，只是在爭權位。倘若政黨違背了台灣人民的利益，則終將受到社會力量的反撲。再者，由於台灣長期受到黨國體制的獨裁統治，加上媒體受到統派勢力的把持，使民眾在黨化教育與宣傳下，無法理性且基於自身利益進行投票，因此選舉結果可能只是選民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的呈現，並不是真實的社會利益，若依據Downsian model的選票極大化策略結果來制訂政策，反映的恐怕不過是統派意識形態思維。最後，誠如Heywood所提醒的，政策形成不能忽視壓力團體的角色。在台灣，代表台灣民族主義和中華民族主義的

政黨及其聯盟，事實上才是形塑台灣外交、中國政策的主要力量，而非選民。

參、民族主義與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

學者認為，台灣社會是一個民族主義²分歧的社會（管碧玲，1994；施正鋒，2000；林佳龍，2001），就是台灣民族主義和中華民族主義的衝突和對抗。1949年國民黨政權於國共內戰失敗後轉而佔領台灣，並將中華民族主義塑造成宰制的意識形態，藉以統治、馴化台灣人，使得台灣的族群衝突升高到「國家界定」的民族主義式衝突，中華民族主義和台灣民族主義形成對抗的關係。就Andrew Heywood（1992:150-163）的分類，中華民族主義可說是一種民族沙文主義（national chauvinism）與保守的民族主義（conservative nationalism），其強調侵略與軍事主義，及民族愛國主義下的公共秩序與社會一體，是一種反動的民族主義。而台灣民族主義則呈現出反殖民主義（anti-colonialism）與自由的民族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之基調，其在殖民統治下形成民族意識與追求民族解放，及追求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與自我管理（self-government），是一種進步的民族主義。這兩類對抗的民族主義是台灣最重要的衝突結構，這也使台灣的民意呈現統獨對立的U字型分布，而不會是單峰型分布。

再回到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問題。中華民族主義的一個中國原則，一直是戰後國民黨政權對外政策的基礎，也是獨裁政體體制的根本。在冷戰時期，因為一個中國原則與漢賊不兩立的立場，使台灣在國際現實下被趕出聯合國。回顧歷史，1949年

國民黨政權內戰失敗來台，自此以後，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即受到當時蘇聯及親共集團國家挑戰。自1950年起，「中國代表權」問題每年均為聯合國內部辯論議題之一，但由於當時國際政治的基本結構係美蘇兩極對立，民主與共產集團壁壘分明，中華民國在以美國為主等國家支持下，聯合國大會年年通過緩議案，以程序的手段策略，撇開對實質內容的考慮，中華民國聯合國的席位長期獲得確保。然一九六〇年代末期，中蘇共交惡日深，而美國亦亟思自越戰之泥淖中撤出，遂提出以「談判代替對抗」的「和解」外交政策。由於美國態度逐漸轉向，國際局勢轉趨對中華民國不利。1971年10月當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秘密訪問中國，國際間認為美國對中國政策已有重大轉變，加上亞、非洲新興國家大量進入聯合國，擱置拖延的策略已經行不通（夏立言，1998：6）。中國代表權問題終於被正式列入聯大議程，就問題的實質加以討論決定。而當時美國的新策略是解決中國代表權問題必須以「重要問題」來表決，也就是需以大會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在1971年聯合國大會中，數個方案被併案提出討論，首先是阿爾巴尼亞等二十三個國家提案，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並排除蔣介石政權，這是第一個方案。第二個方案是美國等國家所提出的「兩個中國」案，主張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但是要繼續保留中華民國的席次。另外尚有由沙烏地阿拉伯所提出的「一中一台」案，主張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中國代表權，包括安全理事會的席位，而台灣則繼續以台灣的名義留在聯合國之內。在情勢非常緊張的狀況下，聯合

國大會首先就阿爾巴尼亞案投票，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容共排我」的第二七五八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並驅逐「蔣介石代表」。中共在聯合國成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不但如此，其他聯合國體系的相關國際組織也都先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陳隆志，2001：7-8），台灣逐漸孤立於國際社會。

對基於台灣民族主義主張並推動台灣獨立的反對運動而言，「台灣加入聯合國」可謂達成其目標最為直接的方式。因此有關台灣應該加入聯合國的主張早在海外反對運動發展的初期就已出現，並在一九六〇年代末期隨著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出現而逐漸落實在海外反對運動的理論和行動層次上。在台灣退出聯合國之前，海外反對運動推動加入聯合國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五〇到六〇年代初期是由廖文毅主導，主要策略在設法運用國際力量將台灣視為新解放的殖民地，並由聯合國加以託管，再過渡為獨立的國家進入聯合國。第二階段六〇年代末期，海外台獨運動人士，包括陳隆志、彭明敏等，主要策略乃在針對當時討論逐漸趨於激烈的中國代表權問題，主張將台灣與中國加以區隔而分別擁有聯合國席位，從而藉此彰顯台灣主權獨立，而與中國無涉的訴求。他們同時主張使用公民複決或投票的方式，由台灣人民自決台灣前途。不過隨著1971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的解決，海外反對運動在加入聯合國議題上的活動也暫告一段落。

八〇年代末期台灣內部展開民主化過程，隨著人權、民主等議題漸次獲得成果，海外反對運動的訴求也轉移到台灣國際地位或台灣前途問題之上，在這個背景下加入聯合國的議題也再度出現，1990年8月，

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設立了「重返聯合國委員會」，開始了海外反對運動在加入聯合國議題上的另一個活動階段。

在台灣內部，由於七〇年代末期台美斷交的外交危機，使反對運動者認為必須透過建立新國家的方式，來扭轉台灣發生外交巨變後的國際地位，加入聯合國的主張就是能夠確保台灣國際地位與安全的大方向。1986年民進黨成立，在其黨綱草案中列入「積極爭取重新加入聯合國」的文字，並在同年中央民代選舉中以「重新加入聯合國」作為該黨共同政見之一（關弘昌，1996：73-79）。

因此我們可以說，九〇年代之前中華民族主義的國民黨政權一個中國政策，使台灣喪失了國際地位，但是秉持台灣民族主義的海內外反對運動，則開始以一台一中的國家定位，努力推動台灣重新加入聯合國。

肆、民族主義與九〇年代台灣加入聯合國

一、九〇年代兩種民族主義的發展

1991年結束動員戡亂時期，國民黨政權不再視中共政權為叛亂團體，又宣告治權僅及於台灣，其實就是放棄對中國主權的訴求。具體而言，此時代表中華民族主義陣營的李登輝，其中國政策為「一個中國、兩個地區、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也就是「一國兩府」（施正鋒，2001：124）。據此，其建構出「務實外交」的政策論述與實踐，開始將中華民國稱為「中華民國在台灣」，並在官方談話中交互使用「中華民國」和「台灣」（林佳龍，2001：250），最後發展成「分裂國家，平行代表權」的「兩德模式」。基本

上，國民黨在他的領導下，仍追求一個中國的未來統一目標，認同的符號仍是中華民族的符號，台灣現階段地位仍是過渡性地位。由於此一模式允許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對台灣前途之決定權，也因此國際上難以突破（管碧玲，1994：176-177）。

1999年7月，李登輝進一步提出「兩國論」，國民黨的中國政策正式調整為「兩個中國」（Two Chinese States），從此要擺脫「一個中國」的羈絆，大體朝台、中兩國分立的方向走（施正鋒，2000：58）。不過，「兩國論」與「一台一中」仍有相當大的距離，兩國論指的是「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國家領土的主張重疊，且「兩國論」的當事國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不接受「兩國論」，兩德模式自然無法援用，因此「兩國論」仍然無法永遠解決台灣國家地位問題（李憲榮，2001：43）。儘管李登輝的「中華民國第二共和」主張，中華民國已不再是原來的中華民國，而是「新的共和」，台灣的認同問題已經成熟到「台灣中華民國」的階段（李登輝、中嶋嶺雄，2000：40-43），但這終究仍維繫在中華民國體制內，且想要保有虛幻的「華人文化認同」，並非要建立真正以台灣本土為中心的新國度（施正鋒，2000：55）。

總而言之，九〇年代李登輝回應了台灣民族主義，而模糊其所代表的中華民族主義，因而獲得台灣民族主義者與他微妙的互動，形成一種隱性的聯盟，結果促成國民黨順利的台灣化（管碧玲，1994：173），但絕非真正的本土化。正統的中華民族主義者則先是自國民黨中分裂出中國新黨，並在二千年總統大選後再分裂出親民黨，

這也再次說明台灣的民意分布絕非單峰型，否則統派端點的政黨就很難出現。

而在台灣民族主義陣營方面，由於國民黨外來政權的大中國戡亂體制之結構矛盾，使民進黨得以將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權力矛盾，轉化為族群之間的認同衝突，進而發展成一種帶有強烈本土意識的台灣人政黨（林佳龍，1989：128）。然而民進黨內部一直有迴避台灣民族主義的路線爭議，因而1988年通過充滿修辭的「四一七主權獨立決議文」，主張在四個假設條件下，民進黨才要支持台灣獨立。一直到1991年，民進黨為了防堵海外台獨人士集體返鄉，才匆匆通過所謂的「（公投）台獨黨綱」，接受台灣民族主義的訴求（施正鋒，2000：60-61）。

民進黨內部在通過台獨黨綱後，也凝聚了黨內派系支持選舉總路線（Cheng & Hsu:1996:147；郭正亮，1997）。然而選舉競爭卻產生對政治菁英的馴化作用（林佳龍，2001：238-240），因為選舉競爭依據資本主義的邏輯進行，資源的規模往往與所獲選票的規模成正比，由於統派長久以來擁有制度性資源和較多物質資源，不平等競爭架構的偏差動員使選舉成為其麻痺人心，加強既有秩序合法性的有效手段（管碧玲，1994：24-25）。證諸民進黨確實如此。

民進黨作為台灣民族主義政黨，但卻在1991年二屆國大選舉失利後，從此認為台獨訴求是票房毒藥，而在1995年開始其所謂政黨轉型³。透過政黨領袖的論述，包括施明德的「民進黨如果執政，不必也不會宣佈台獨」、許信良的「台獨黨綱是一個歷史文件」等言論，帶動民進黨往國民黨方向靠攏。至1998年底，由於民進黨在立委和台北市長選舉中挫敗，促使民進黨

菁英考慮進一步以承認中華民國的方式來重新論述台灣的國家定位，這呈現在1999年5月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一方面接受「兩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vs. 中華民國）為事實，但同時也將中華民國「台灣化」，強調台灣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國號叫中華民國。之後總統候選人陳水扁更提出兩個華人國家的說法（林佳龍，2001：257-258）。這樣的論述只會使台灣走不出國共之間「一個中國」的爭執，我們不禁感嘆，民進黨只是要取得「政權」（regime）背後龐大的國家資源，而非要建立嶄新的「國家」（施正鋒，2000：63）。這樣的轉型結果，促使部分台灣民族主義的群眾，在去年立委選舉轉而支持台灣團結聯盟，形成國會的第四大黨。而獨派的社會基礎亦積極支持形塑「國安聯盟」，展開與國、親「在野聯盟」的抗衡，藉以穩定政局，壯大台灣。

二、民族主義與九〇年代台灣加入聯合國

如前所述，兩種民族主義貫穿了九〇年代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外交政策，因而有「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⁴與「台灣申請加入聯合國」⁵兩種推動方式。2000年之前，執政的中華民族主義國民黨政權外交政策運用的是「分裂國家理論」，主張聯合國原始會員國中華民國在1949年以後分裂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以及「中華民國（在台灣）」；而1971年聯合國大會的做法，原本的中華民國僅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這根本忽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在，所以應該給予原本中華民國的部分權利，也就是取得聯合國普通會員國的席次，這就是「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的說法。然而分裂國家如東西德及南北韓，都是先經過互相承認主權，然後才一

起加入聯合國，因此由於中國不可能放棄「一個中國」的立場，因此分裂國家理論不可能適用（許世楷、施正鋒，2001：45）。

詳細言之，1993年起黨國體制下的外交部開始依據「分裂國家理論」展開中華民國參與聯合國。1993年至1996年，皆以洽請友邦駐聯合國代表聯名致函聯合國秘書長提案，要求聯合國設立特別委員會，研究中華民國無法正常參與國際活動的特殊情況作為推動之主軸（吳子丹、沈斯淳，2001：26）；再來則是要求聯合國大會重新檢討、撤銷或修改1971年所通過的二七五八號決議，以期達到所謂「分裂國家平行代表權」的模式，用「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名稱參與；1999年則是恢復要求聯合國「設立工作小組」以審視中華民國在台灣所處的特殊國際處境，以確保台灣人民參與聯合國之基本權利（陳隆志，2001：8）。由於國民黨政權的中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導致執行策略上也顯現出諸多偏差，包括委託他國提案，不願嘗試新會員申請入會模式；執意於分裂國家平行代表權；從不自稱「台灣」；及始終圍繞聯合國第二七五八號決議論述等等（黃昭元，1998），導致踏不出台灣自己的路。

而台灣民族主義陣營依據的外交政策觀點是「新生國家理論」（許世楷，1999、2002；許世楷、施正鋒，2001；陳隆志，2002），主張在1951年的「舊金山合約」，日本僅聲明放棄台灣，但並未提及領土歸屬國為何國，在台灣國民黨政權只不過是受盟軍命令實行佔領，因此台灣國際地位未定。不過自從1949年以來，台灣的土地以及人民固定，在這人民、領土之上有一個事實上獨立而有效統治的政

府，已形成「獨立的政治實體」，再經過一九九〇年代的民主化，所有民意代表、總統均由國民直接選舉，台灣已經成爲一個「事實上的獨立國家」，與中國無涉。而要進一步成爲「法理上獨立的國家」，必須經過：第一、放棄「中華民國」，因爲1971年聯合國大會的二七五八號決議否決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代表中國，指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爲唯一合法代表，所以國際上認爲「中華民國」已經滅亡。而且國際上「中華民國」易於被混淆爲中國，不能突顯台灣的存在，不利於台灣的外交。第二、向國際社會清楚表達獨立建國的意志。上述兩個手續可以用「以台灣名義申請新加入聯合國」，一個動作完成。

詳細言之，九〇年代初期台灣民族主義的民進黨，基於台獨黨綱，明確主張「一台一中」，透過公民投票來建立新的「台灣共和國」，並以新會員國的身分，重新申請加入聯合國。1991年9月，民進黨密集發起幾次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活動，包括公投會發起的「公民投票加入聯合國」遊行，及呂秀蓮組織「台灣加入聯合國宣達團」等，對此一議題的持續與擴大產生相當大的作用。民進黨在之後仍不斷進行議會路線之外的相關活動，活動範圍不侷限於台灣的造勢、組織或選舉活動，還包括在美國的集會活動、對各國駐聯合國代表以及美、日國會議員或政要的遊說拜會等外交活動。活動的形式和內容包括大型集會、遊行等群眾運動，也有直接拜會遊說的菁英外交，及參加國際研討會討論台灣民主發展與國家安全等課題。而海外反對運動團體，如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台灣國際關係中心（CTIR）及其他台僑社團，也都扮演一定的角色。

至於在選舉體制內，加入聯合國亦普遍列為民進黨候選人的共同政見（關弘昌，1996：88-103；羅欣怡，2001：68-69）。

然而1995年以後，民進黨展開政黨轉型，以一中一台加入聯合國的訴求逐漸淡化，外交政策論述轉變為「台灣應廣泛參與國際社會，並以尋求國際承認，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為奮鬥努力的目標」等語（羅欣怡，2001）。民進黨的外交政策越來越像國民黨。而在2000年台灣人民以選票將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送進總統府，完成政黨輪替後，新政府加入聯合國政策仍然和國民黨相差無幾。2000年剛上台，無暇檢討外交政策，乃援往例辦理，2001年又回到請友邦提案，要求聯合國大會成立工作小組，研究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所處特殊國際情勢及確保其兩千三百萬人民參加聯合國及其附屬機構。今年則將提案標題修改，將往年「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用語，改為「中華民國（台灣）」，仍由友邦代我提案，內容指出，中華民國（台灣）是經由民主程序選出的政府，是唯一能夠在聯合國內代表台灣人民利益與願望的合法政府，第廿六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有關中國代表權的二七五八號決議，並未解決台灣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自由時報，2002.8.15）。儘管今年的提案內容強調了第二七五八號決議僅解決中國代表權問題，而沒有解決台灣的代表權，凸顯了台灣跟中國互不隸屬，互不代表的事實，但提案名稱仍未能以台灣為名義，且未朝主動申請加入成為新會員國的做法前進，難以凸顯台灣是獨立國家的意涵。中華民國體制依舊框限住台灣的外交政策，如果台灣不能排除內部干擾，取得共識，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那成功的時

機永遠不會到來（張旭成，2001）。

伍、結論

本文從檢討唐斯模型（Downsian model）的假設出發，說明其多項缺失，並指出其不適用於意識形態分歧的台灣。長期處於統派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及媒體宣傳下的台灣選民，事實上未必是依照自己真實的利益理性投票，選舉結果只是反映優勢族群建構現實的成效而已。如前所述，在台灣，代表台灣民族主義和中華民族主義的政黨及其聯盟，事實上才是形塑台灣外交、中國政策的主要力量，而非選民。2000年政黨輪替後，黨國體制瓦解，民間社會多元主義力量興起，充分體現社會的利益，其中由民進黨、台聯及無黨籍民間人士三股力量組成的「國安聯盟」，正扮演著推動台灣本土化內政、外交政策的重要關鍵角色，因此民進黨政府應運用這股本土力量的支持，推動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否則若採用Downsian model發展出的選票極大化策略，將選舉結果和政策制訂聯繫在一起，那台灣終究走不出中華民國體制，也走不出台灣自己的未來。

【註釋】

- 1.陳水扁總統8月3日在世台會東京年會開幕式所說的「一邊一國論」詳細內容為：「台灣是我們的國家，不能被欺侮、被矮化、被地方化，台灣不是別人的一省，也不是中國的地方政府，台灣不能做第二個香港或澳門，中國和台灣在台灣海峽兩邊，一邊一國，必須分清楚」。見自由時報，2002年8月4日報導。
- 2.關於民族主義各家理論，礙於篇幅，並非本文重點，本文參照管碧玲的定義，即「民族主義」為一個民族（潛在的或

實際存在)的成員的覺醒，這種覺醒是為促進該民族之利益，包括實現、維持與持續該民族的認同、整合、繁榮與權力等目的。民族主義的要素應包括一、認同的領土；二、共同的歷史；三、共同的語言文字；四、共同的文化；五、渴望政治的獨立。其中二、三、四項客觀要素，可能是想像的也可能是實際的，當然也可能是虛構的。見管碧玲，1994。《民族主義與台灣政黨政治》，頁15。

- 3.有關民進黨轉型過程詳細論述，見郭正亮，1998。《民進黨轉型之痛》。
- 4.國民黨的說法為，造成中華民國在聯合國長久缺席的國際政治氛圍，已隨共產主義的式微與冷戰結束而告消失。因此，現在中華民國應尋求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同享平行代表權」的方式重返聯合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決策者不需視與中華民國同享代表權為中國統一的阻礙。事實上它將形成另一個論壇，使兩岸的代表有更多的接觸、促進彼此的了解，並對雙方所期待的國家統一形成共識。見吳東昇，1993。《聯合國問題與中華民國在台灣》，頁2。
- 5.在1995年之前，民進黨對台灣的聯合國代表權問題的看法非常明確，就是民進黨願和國民黨合作推動台灣參與聯合國，但強調以中國統一為前提是行不通的，因為台灣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政府，民進黨主張一中一台，透過公民投票建立新的台灣共和國，並以新會員國的身分，重新申請加入聯合國。見張富美，1993。《從民進黨的觀點看台灣的聯合國代表權》，頁3。

【參考書目】

- 1.Cheng, Tun-jen and Hsu, Yung-ming (1996) "Issue Structure, the DPP's Factionalism and Party Realignment" In Hung-mao Tien ed.,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Riding the Third Wave*, pp.137-173,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 .
- 2.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 3.Hague, Rod. Harrop, Martin. and Breslin, Shaun. (1998) *Comparativ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Macmillan Press.
- 4.Heywood, Andrew (1992) *Political Ideologies: An Introduction*. Macmillan Press.
- 5.Wu, Yu-Shan (2001) "Does Chen's Election Make Any Differenc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nstraints on Taipei, Washington, and Beijing," In Muthiah Alagappa, ed., *Taiwan's Democratic Politics: Democratization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pp.155-192, (Armonk, New York: M.E.Sharp).
- 6.自由時報，〈12國提案，支持我加入聯合國〉。2002年8月15日。
- 7.自由時報，〈TVBS民調，公投自決，六成二民眾支持〉。2002年8月5日。
- 8.自由時報，〈總統：台海兩岸，一邊一國〉。2002年8月4日。
- 9.吳子丹、沈斯淳，2001。〈我國參與聯合國努力的回顧與檢討〉。《新世紀智庫論壇》，第14期，頁24-29。
- 10.吳玉山，1998。〈台灣的大陸政策：結構與理性〉。收於包宗和、吳玉山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頁153-210。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11.吳東昇，1993。〈聯合國問題與中華民國在台灣〉。《國策雙周刊》，第72期，頁2。

12. 李登輝、中嶋嶺雄，2000。《亞洲的智略》。台北：遠流。
13. 李憲榮，2001。〈「兩國論」的入憲問題〉。收於黃宗樂編，《台灣的危機與轉機》，頁29-44。台灣教授協會。
14. 彼薩列夫、林湘義，〈兩種民族主義的戰爭與兩岸關係〉。《自由時報》，2002年2月2日，版15。
15. 明居正，1998。〈向心競爭與中華民國政黨政治之發展〉。《理論與政策》，第12卷第2期，頁142-156。
16. 林佳龍，1989。〈威權侍從政體下的台灣反對運動—民進黨社會基礎的政治解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卷1期，頁117-143。
17. 林佳龍，2001。〈台灣民主化與國族形成〉。收於林佳龍、鄭永年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頁217-266。
18. 林佳龍、郭臨伍，2000。〈從雙層賽局看「兩國論」〉。收於黃昭元編，《兩國論與台灣國家定位》，頁473-513。台北：學林。
19. 林濁水、梁文傑，1999。〈台灣政黨轉型與民眾統獨意向的變遷〉。《中國大陸研究》，第42卷第6期，頁59-77。
20. 施正鋒，2000。《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台北：前衛。
21. 施正鋒，2001。《台中美三角關係》。台北：前衛。
22. 夏立言，1998。〈參與聯合國：一項長期艱困之工程〉。《新世紀智庫論壇》，第3期，頁6-9。
23. 張旭成，2001。〈論如何推動我國新外交戰略〉。收於黃宗樂編，《台灣的危機與轉機》，頁105-117。台灣教授協會。
24. 張富美，1993。〈從民進黨的觀點看台灣的聯合國代表權問題〉。《國策雙周刊》第72期，頁3。
25. 許世楷，1999。〈獨立建國才是最安全的選擇〉。《共和國雜誌》，第9期，頁19-21。
26. 許世楷，2002。〈「新生國家理論」的提倡〉。《共和國雜誌》，第25期，頁3-4。
27. 許世楷、施正鋒，2001。〈如何結合政府、企業及民間的力量促進加入聯合國？〉。《新世紀智庫論壇》，第14期，頁43-48。
28. 郭正亮，1997。〈選舉總路線下的民進黨〉。收於游盈隆編，《民主鞏固或崩潰》，頁204-222。台北：月旦出版社。
29. 郭正亮，1998。《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文化。
30. 陳明通、王智盛，2000。〈2000年總統大選民進黨中國政策之研究〉。《中國事務》，第1期，頁6-28。
31. 陳隆志，2001。〈台灣與聯合國—回顧與展望〉。《新世紀智庫論壇》，第14期，頁7-11。
32. 陳隆志，2002。〈請聯合國重審二七五八號決議〉。《TaiwanNews總合周刊》，第42期。
33. 黃昭元，1998。〈我國政府推動參與聯合國策略的檢討〉。《新世紀智庫論壇》，第3期，頁10-14。
34. 管碧玲，1994。《民族主義與台灣政黨政治》。台大政研所博士論文。
35. 羅欣怡，2001。《民進黨政黨轉型與對美外交之決策過程》。淡江美研所碩士論文。
36. 關弘昌，1996。《台灣的威權政體轉型與外交政策：論「參與聯合國政策」之形成》。台大政研所碩士論文。